



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 美国与联邦德国关系研究 (1958-1963)



叶晓东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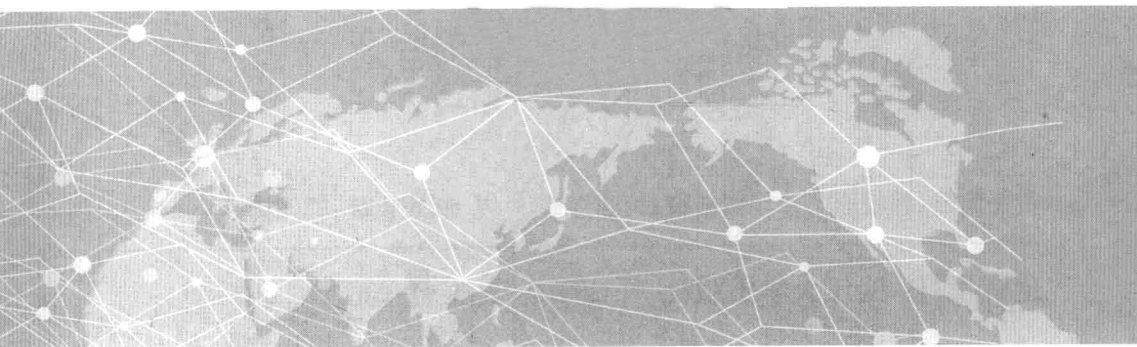
武汉大学出版社



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 美国与联邦德国关系研究 (1958-1963)



叶晓东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美国与联邦德国关系研究(1958-1963)/叶晓东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307-11938-3

I. 第… II. 叶… III. 国际关系史—研究—美国、德国—1958 ~ 1963 IV. ①D871.29 ②D851.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1999 号



责任编辑:程牧原

责任校对:鄢春梅

版式设计:韩闻锦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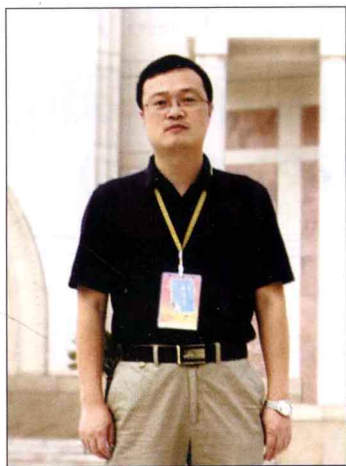
印刷: 湖北睿智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5.75 字数: 224 千字 插页: 2

版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1938-3 定价: 34.00 元

作者简介



叶晓东，男，1976年12月生，历史学博士。现为湖北经济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部副教授，中国德国史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史，曾在《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国际论坛》、《历史教学》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

内 容 简 介

第二次柏林危机是东西方关系的一次危机，也是西方阵营内部关系的一次危机。这次危机对西方集团内部的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对德美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危机发展，美国 and 联邦德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开始显现出来，两国关系也经历了一个从不信任、冷淡直至紧张的过程。但为了共同的利益，双方关系并没有走向破裂，而是小心翼翼地予以修补和维持。本书主要考察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美国与联邦德国在危机处理问题上产生的分歧与相互妥协，揭示在冷战背景下，两国既斗争又合作的关系。

在引言部分，笔者介绍了论文的学术背景，包括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研究任务等。

第一章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结束后至第二次柏林危机前的德美关系进行回顾。二战后，出于对苏冷战的需要，美国对德严惩政策逐渐转变为扶持政策。为了增强对抗苏联的实力和稳定西欧，在美国的一手扶持下，建立了联邦德国，从而造成了德国的分裂。联邦德国成立后，美国给予了不遗余力的支持，使其经济迅速复苏，主权得以恢复，并在北约框架下实现了重新武装。与此同时，为了使德国不再成为欧洲力量平衡的破坏者，美国努力用条约体系将联邦德国维系在西方阵营之内。在美国与联邦德国的关系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这预示着，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两国之间的分歧将不断暴露出来。

第二章分析了第二次柏林危机发生的国际背景以及赫鲁晓夫发动危机的动机。第二次柏林危机的爆发看似突然，实际上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美苏两国新任领导人的上台，东西方关系总体趋势是走向缓和。东西方关系缓和使赫鲁晓夫看到了通过谈判与美国达成妥协的希望。东西方关系缓和并不意味着德国问题的解决，经过二战后初期在德国问题上的较量，

美苏越来越认识到，只有承认德国分裂的现状才符合双方的利益。德国问题中最为敏感的是柏林问题，美苏等大国都在此有重大利益。由于柏林地位的特殊性，为苏联以柏林问题向美国施压提供了绝佳的场所。而在美苏核对峙下，联邦德国谋求核武装以及美国对此的支持，则让赫鲁晓夫如坐针毡。学术界普遍认为，赫鲁晓夫发动第二次柏林危机既是防御性的也具有进攻性，其要达到的目的是多重的。

第三章对危机开始阶段美国与联邦德国对危机所作的不同判断和出现的分歧进行了分析。对于这场危机，美国与联邦德国站在本国的立场上，对赫鲁晓夫的动机以及西方要采取的应对措施给出了不同答案。危机一开始，两国的分歧便暴露出来，在是否承认东德、德国重新统一的方式这两个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上，美国的动摇让联邦德国感到不安。虽然在联邦德国的敦促下，美国最终回到了一贯的立场上，但联邦德国对美国的怀疑却从此扎下了根。

第四章论述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实施对苏联谈判政策的过程中与联邦德国之间所产生的种种意见分歧。经过危机初期的反复酝酿，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定在进行军事准备的同时，寻求通过谈判解决危机。尽管认为在柏林问题上没有谈判的必要，但为了使紧张形势得以缓和，联邦德国政府勉强同意进行谈判。为了避免在谈判过程中美苏私下达成交易，联邦德国政府一度表示可以考虑“让步”，但这种灵活态度并没有持续多久。在日内瓦外长会议之前，联邦德国政府的立场反复不定，拖延了西方谈判立场的形成，对此，美国既不满又无可奈何。从日内瓦外长会议到美苏戴维营首脑会议直至流产的巴黎东西方首脑会议，联邦德国政府一直担心美国不能坚持立场，会背着联邦德国与苏联搞妥协。而美国对联邦德国的朝令夕改也颇有微词，以至于不愿意向波恩透露真实的谈判计划。两国之间的不信任充分表现出来。

第五章对肯尼迪上台后在第二次柏林危机政策上的调整及其给德美关系带来的影响进行了论述。肯尼迪上台后，经过内部讨论和磋商逐渐形成了以军事压力促谈判的政策，与前任政府相比，肯尼迪军事准备的力度更大，寻求谈判的决心更强烈。该政策在推行的

过程中，必须得到联邦德国的配合，但联邦德国不管是在承担军事义务方面，还是在制订西方统一的谈判立场方面，都比较消极。“柏林墙事件”中，美国不愿意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引起了联邦德国方面的埋怨，而美国也反过来指责联邦德国所提出的建议不具有可行性，两国关系陷于冷淡。

第六章论述了肯尼迪政府在推动对苏“试探性”谈判过程中与联邦德国出现的分歧。在法国的支持下，联邦德国对肯尼迪政府的对苏谈判政策予以抵制，在这种情况下，肯尼迪政府决定单方面推动对苏谈判。由于得不到联邦德国和法国的支持，这种谈判只属于试探性质。在谈判过程中，每当出现僵局，肯尼迪政府都要回过头来寻求联邦德国方面的意见，希望联邦德国作出让步，以使美国政府对苏谈判中能够提出可以推动美苏谈判的方案。然而，联邦德国政府的立场一直没有松动。为了挽救陷于僵局的美苏谈判，肯尼迪试图将自己的建议强加给联邦德国。这种粗暴处理问题的方式引起了联邦德国方面的强烈反弹，造成了两国之间关系的紧张。但紧张的关系没有持续多久，双方立即采取措施进行修补。

结语指出：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美国试图牺牲联邦德国利益与苏联达成妥协，动摇了联邦德国对于它的西方最强大盟友的信心，迫使联邦德国重新审视其依靠西方实力促进德国重新统一的政策，着手改善与东方之间的关系。对美国的失望，坚定了联邦德国走德法合作道路的决心，促使联邦德国更加密切与法国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二次柏林危机对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影响深远。同时，这一时期的德美关系也对危机的发展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联邦德国与美国之间的分歧，使西方联盟内部很难拟订可以与苏联进行谈判的共同立场与方案，不利于危机的顺利解决。

关键词：冷战；第二次柏林危机；德美关系；分歧；妥协

目 录

引言	1
一、研究意义	1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6
三、研究任务	15
第一章 二战后美国与联邦德国关系的发展	17
一、美国与战后联邦德国的建立	17
二、美国与联邦德国亲密合作关系的形成	29
三、美国与联邦德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40
小结	49
第二章 第二次柏林危机的爆发	50
一、第二次柏林危机爆发的背景	50
二、第二次柏林危机的发生	65
小结	70
第三章 危机的开始阶段与德美分歧的出现	72
一、美国与联邦德国对危机的判断	72
二、分歧的出现	81
小结	96
第四章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苏谈判政策与德美之间的不信任	98
一、对苏谈判前艰难的协调	98
二、对苏谈判过程中阿登纳政府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不信任	114
小结	127

第五章 肯尼迪政府的政策调整与德美关系的冷淡·····	129
一、肯尼迪对美国第二次柏林危机政策的调整·····	129
二、肯尼迪政府的新政策与德美关系的冷淡·····	152
小结·····	164
第六章 美国对苏“试探性谈判”政策与德美关系的紧张 及修补·····	166
一、肯尼迪政府对苏试探性谈判的开展与对阿登纳 政府的排斥·····	166
二、德美之间的再度协调·····	177
三、美国对苏“试探”政策陷入僵局与德美关系的紧张·····	192
四、德美关系的修补·····	205
小结·····	210
结 语·····	211
参考文献·····	226
后 记·····	243

引 言

一、研究意义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国际政治格局出现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由于第三世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崛起，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化，由于帝国主义阵营的分裂，国际关系格局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在纵横交错的复杂格局中，以美苏对立为核心的东西方关系，仍然是国际关系中的要害问题，东西方矛盾依旧是孕育世界战争的主要危险。美苏分别控制着“北约”（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与“华约”（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 WTO）两大军事集团，它们争夺的重点在欧洲。德国问题是战后欧洲问题的核心，而柏林问题又是德国问题中最为敏感的热点。由于柏林（Berlin）位于东西方对峙的最前沿，每当东西方关系发生大的变化时，难免会影响到柏林。用赫鲁晓夫（Nikita S. Khrushchev）的话来讲：“柏林不仅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它是一个气压计。世界政治气候上，压力有了任何微小的变化都会反映在这个地区上，双方都会摩拳擦掌在此进攻或防守对方。”^① 柏林问题之所以是冷战（Cold War）时期东西方紧张关系的标志，是因为美苏等大国在这里都有着重大利益。冷战高潮时期东西方之间的矛盾、冲突，两大阵营有关国家的战略调整和政策动向，常常在柏林问题上集中反映出来。

1958—1963 年，东西方在欧洲的冷战再次聚焦于柏林，围绕西方驻军在西柏林的去留这一核心问题，以美苏为首的双方针锋相

^① Joseph L. Nogge & Robert H. Donaldson:《苏联第二次大战后的外交政策》，黄宗浩译，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4 年，第 133 页。

对。与此相关,在对德和约的缔结、柏林的交通管理、对东德的承认、德国的统一以及欧洲安全等问题上,双方也各执一词,僵持不下。为了所谓不可退让的利益,双方都宣称不惜一战,这就造成了危机的局势,最后导致了第二次柏林危机(The Second Berlin Crisis)的爆发。自1958年11月赫鲁晓夫发表公开讲话,提出将西柏林变成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之时起,直到1963年1月,赫鲁晓夫在德国统一社会党(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 Socialist Unity Party of Germany, SED)第6次党代会上明确表示要结束这场危机,持续四年多的第二次柏林危机才宣告结束。第二次柏林危机是冷战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纷争,这次危机很少时间显得异常尖锐,但却困扰了当时东西方的决策者们4年多的时间。曾任肯尼迪政府国家安全顾问的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回忆说:“第二次柏林危机留在我记忆中的是它的坚久性。从来没有那么一天似乎直接的冲突就要爆发,但是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星期,其间没有关于如果……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或者我们这个或那个盟国将会或者将不会给予支持,或者西柏林的士气是否能够支持下去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①第二次柏林危机的发生、发展及结束对欧洲局势和东西方关系,尤其是美苏关系在欧洲的缓和,有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第二次柏林危机对西方集团内部的关系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对德美关系^②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这样说,第二次柏林危机是东西方关系的一次危机,也是西方阵营内部关系的一次危机。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认为:“不论赫鲁晓夫从他对柏林的威胁中获得了什么其他好处,这种威胁在造成西方联盟内部不和方面所起的作用,肯定是赫鲁晓夫的一个重大收获。”^③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① [美] 麦乔治·邦迪:《美国核战略》,盛冰、朱立群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494页。

② 笔者注:本文所提到的德美关系,指的是美国与联邦德国之间的关系。

③ [美] 亨利·基辛格:《选择的必要》,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73页。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以西方阵营的暂时胜利而告终，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掩盖因国家利益不同而造成的西方阵营内部关系矛盾的一面。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美国与联邦德国之间的不信任、压制与反压制，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问题。第二次柏林危机是东西方关系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德美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如果说第一次柏林危机催生了联邦德国的建立，开启了德美合作的新阶段，那么第二次柏林危机则严重挫伤了历经 10 年所建立起来的德美信任合作关系，促使联邦德国重新审视其与美国之间的关系。

德美关系对美国 and 联邦德国双方而言，都是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在美国的冷战政策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动员自身与盟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与苏联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对抗，欧洲则是美国与苏联进行争夺的重点。联邦德国由于其地理位置、经济实力和军事潜力，成为美国对抗苏联的前沿阵地。从历史上来看，德国一直扮演了欧洲大陆力量平衡器的角色。20 世纪，美国为了遏制德国成为欧洲的霸主进而成为世界霸主而两次参加了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通过一系列条约，美国得以成功地将联邦德国纳入西方阵营，使之成为对抗苏联的得力帮手。维持良好的德美关系，将联邦德国牢牢维系在西方阵营中，既可以免除与德国重新为敌之忧，又可以增强美国对抗苏联的实力。联邦德国成立之时起，阿登纳政府一直坚持“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希望通过与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结盟的方式来维护西德在东西方对峙夹缝中的安全利益。联邦德国成立后，“其外交政策的阶段性目标，就是寻求国家的主权的独立以及完成与西方结盟，其中尤以发展和美国的关系最为重要”^①。通过与西方结盟、为西方防务作出贡献等政策，阿登纳（Konard Adenauer）逐步为联邦德国争取到了主权的恢复。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立足于西方可以使联邦德国置身于西方阵营的保护之下，为联邦德国在东西方的对峙中求得安全保障。另一方面，通过对西方防务作出贡献，换取了

^① Friedemann Bedürftig, *Taschenlexikon Deutschland nach 1945*, München: Piper, 1998, S. 115.

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对其在重新统一问题上的支持。

本书以第二次柏林危机为背景，基于两点理由：一是当危机来临时，各国的外交活动最为活跃和频繁，矛盾与问题也会暴露得最为充分，特别是对于同盟体系来说，合作和分歧会有充分体现。二是危机对于同盟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共同的威胁会成为同盟的黏合剂，促使联盟更加巩固；另一方面，在面临共同威胁时，同盟体系内部的国家对威胁的感受程度不一，对威胁的解读方式也会不一样，可能导致同盟内部出现意见分歧，从而动摇同盟的基础。所以要检验同盟的可靠性，最好的方式是研究其在危机面前的反应。

对于第二次柏林危机，学术界更多的是从美苏摩擦、第二次柏林危机与古巴导弹危机之间的关系、苏联政策的制定、美国政府如何进行危机管理等方面来予以研究。侧重于其中美苏对抗的一面，将其定义为美苏两国之间的一次正面交锋。然而，无论是从危机涉及的领域还是从其牵涉的国家来说，仅仅从美苏对抗的角度来看待这场危机是不够的。这次危机是由对柏林的占领及管理所引发的争端，但它绝不只是一个柏林问题，正是由于柏林问题从属于德国问题这一特殊性，这场危机更多的是与德国问题联系在一起；而德国问题的解决必定涉及欧洲政治格局的重组，因此，危机又涉及欧洲的安全安排问题。这场危机牵涉多个国家，特别是涉及分别属于美苏两大同盟体系的众多国家，而同盟体系内的国家也有着其各自的国家利益，因而对于解决危机都有着自己的看法。美国和苏联的外交政策虽然决定了危机的主要走向，但要看到，由于它们本身分别属于各自的阵营，为了维持本阵营的团结，要注重听取盟国的意见。具体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特别是与柏林问题有密切关系的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这四个国家，与柏林问题的相关程度决定了它们各自不同的外交方针。英国的立场与美国比较接近，法国出于拉拢联邦德国的目的，对阿登纳政府的政策目标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从这个角度看，在西方四大国之间，实际上分成了两派，美国和英国为一方，联邦德国和法国为另一方。从利益关切程度来看，美国和联邦德国对于柏林问题最为关注，不同的是一个在

台前，一个在幕后。可以说，在西方阵营内部，美国和联邦德国两国间的协商是西方阵营内部围绕柏林和德国问题所展开的外交活动的主线。对于美国来说，柏林是它的一个冷战前哨阵地。美国的决策者更多的是把柏林问题看成一场意志的较量，维持其在柏林的存在可以显示美国对抗苏联的决心，这就要求美国在苏联的要求面前，至少在公开的场合表现出足够的强硬。苏联对柏林的威胁相对美国而言，并不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所以，美国也不愿意为了柏林问题而与苏联兵戎相见。与苏联进行谈判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出路。问题在于，在柏林问题上与苏联进行谈判，回旋余地很小。所以美国试图把谈判范围扩展到整个德国问题以及欧洲安全问题，希望在这些范围广泛的领域内，对苏联进行让步，以求得苏联放松在柏林问题上的压力。对于联邦德国而言，柏林作为未来的首都和德国重新统一希望的象征，涉及国家的核心利益。西柏林离开美国等西方大国的保护是无法生存的，这就需要维持西方三大国在柏林的军事存在。在这一点上，联邦德国和美国的立场是一致的。在涉及整个德国问题和欧洲安全问题与苏联进行谈判时，要防止美国与苏联以牺牲联邦德国利益的方式达成妥协。由于西柏林处于三大国占领状态，联邦德国并无权参加与苏联进行的有关柏林问题的谈判。但这并不表明联邦德国在涉及自己国家利益的谈判中只能作壁上观，它可以对盟国特别是美国的谈判立场施加影响，对美国起到一定的牵制作用。可以说，联邦德国处理柏林危机的主要方式就是积极开展对美外交，与美国进行协调，从而发挥作用。然而，联邦德国在与美国协调立场的过程中不能显得过分强硬，以免承担破坏局势缓和的责任。由此可见，无论对美国还是对联邦德国来说，在处理第二次柏林危机的过程中，都既不能表现得过于软弱，又不能过于强硬。随着危机发展，联邦德国和美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开始显现出来，两国关系也经历了一个从不信任、冷淡直至紧张的过程，但为了共同的利益，双方关系并没有走向破裂，而是小心翼翼地予以修补和维持。

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美国试图牺牲联邦德国的利益与苏联达成妥协，动摇了联邦德国对于它的西方最强大盟友的信心，迫使联

邦德国重新审视其依靠西方实力促进德国重新统一的政策，着手改善与东方之间的关系。对美国的失望，坚定了联邦德国走法德合作道路的决心，促使联邦德国更加拉近与法国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二次柏林危机对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影响深远。同时，这一时期的德美关系也对危机的发展进程产生了影响，联邦德国与美国之间的分歧，使西方联盟内部很难拟订可以与苏联进行谈判的共同立场与方案，不利于危机的顺利解决。

对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的德美关系以及这次危机对德美关系造成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可以加强对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西方阵营内部关系的认识，而且通过对这一个案的分析，能以小见大，把握冷战的一些特点和规律，从而有助于全面认识冷战这一特殊历史现象。这一选题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通过对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的德美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说明，即使在冷战时期，面对共同的敌人，国家利益仍然是西方国家决定其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苏联的解体虽然意味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共同威胁消失了，但美国与其西方盟国之间基于国家利益差异存在的严重分歧并没有随之消失。有理由相信，美国的西方盟国不会听命于美国的控制，多极化的世界格局的建立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同时，研究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的德美关系，有助于加深对西方大国关系发展内在机制的认识，还有助于我们以史为鉴，在现实国际政治中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学者的著作中，可以在第二次柏林危机和德美关系这两个专题框架下找到与本书相关的研究成果。笔者将其代表性的观点予以归纳如下：

1. 关于美国政策给德美关系带来的影响

杰克·M. 希克（Jack M. Schick）对艾森豪威尔政府以谈判为手段处理第二次柏林危机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并较多地将责任归咎

于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他认为, 美国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率西方盟国参加对苏谈判, 谈判挫伤了大西洋联盟, 因而也损害了德美关系。^①

与希克不同, 威廉·布尔 (William Burr) 的研究指出, 艾森豪威尔 (Dwight D. Eisenhower) 应对第二次柏林危机的政策是坚定的、得当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危机一开始就决定在紧急情况下, 动用有限的武力来对付苏联以及东德的挑衅行为。如此就可以对苏联的冒险行为予以遏制, 并维持联邦德国对西方联盟的信心。美国政府特别担心与东德政府官员打交道, 害怕因此会导致对东德的承认, 并使联邦德国政府对重新统一的前景感到绝望。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 如果丢掉西柏林这个冷战前哨阵地, 将会在欧洲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联邦德国就会走上中立化的道路, 并与苏联单独达成安全上的协议。^②

考瑞·沙克尔 (Kori Schake) 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处理第二次柏林危机的政策显然也持赞赏态度。沙克尔指出, 艾森豪威尔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基本上是谋求与盟国取得一致, 特别是与联邦德国取得一致。因为联邦德国之所以忠于西方联盟, 是由于北约盟国拒绝将德国分裂长期化、合法化。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 艾森豪威尔给予联邦德国政府涉及德国重新统一、常规力量裁军以及是否承认东德等一系列问题的否决权。沙克尔对肯尼迪政府的第二次柏林危机政策提出了批评, 他认为, 肯尼迪 (John F. Kennedy) 急于消除紧张局势, 以至于他将西方大国支持德国重新统一的承诺以及对联邦德国政府立场的支持看成是与苏联进行成功谈判的障碍。正是由于肯尼迪政府缺乏与苏联进行斗争的经验, 导致了危机的升级, 并使美国与西方盟国特别是与联邦德国的关系恶化。肯尼迪政府不能始终

① Jack M. Schick, *The Berlin Crisis, 1958-1962*,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1, p. 207.

② William Burr, "Avoiding the Slippery Slope: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and the Berlin Crisis, November 1958-January 1959", *Diplomatic History* xviii: 2 (Spring 1994).

如一地采取强硬立场，这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西方盟国特别是联邦德国对美国的信心。^①

阿尔弗雷德·格罗塞（Alfred Grosser）则认为，无论是艾森豪威尔还是肯尼迪，在处理第二次柏林危机问题上都显得犹豫不决。格罗塞指出，艾森豪威尔及其顾问在愿意缓和与决心不放弃已经在握的东西这两者之间举棋不定，但最终倾向于为他们已经在握的西柏林获得保证，以此来交换已不再属于他们的另一个德意志国家及其与波兰边界在法律上的让步。对这样一种妥协倾向，阿登纳和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两人都是不能接受的。肯尼迪上台后，他在柏林问题上更加不愿意听从阿登纳的建议，双方从未建立过友好关系。“柏林墙”修筑后，美国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应对措施。这对阿登纳政府的欧洲和大西洋政策以及德国重新统一政策都是沉重的打击。^②

吉尔·卡斯特纳（Jill Kastner）进一步指出，第二次柏林危机对法德关系的接近起到了促进作用。他认为，德美之间在处理危机上的分歧，损害了自联邦德国成立以来与美国之间建立起来的信任合作关系。在这场危机结束后，曾经将美国当成最可靠盟友的阿登纳，转而与法国总统戴高乐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到危机渐渐淡出公众视线的1962年，在阿登纳的认识中，法国和美国开始更换角色。美国成了变化无常、不可靠的代名词，并随时准备违反已经达成的协议。尽管戴高乐的行为有时不可预知，但法国相对于美国和英国来说，是联邦德国更为可靠的盟友。^③

① Kori Schake, “A Broader Range of Choice? US Policy in the 1958 and 1961 Berlin Crises”, John P. S. Gearson & Kori Schake (eds.), *The Berlin Wall Crisis: Perspectives on Cold War Allianc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p. 22-23, p. 27, p. 33.

② Alfred Grosser, *The Western Alliance: European-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1945*,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80, pp. 239-248.

③ Jill Kastner, “The Berlin Crisis and the FRG, 1958-1962”, John P. S. Gearson & Kori Schake (eds.), *The Berlin Wall Crisis: Perspectives on Cold War Allianc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 125, p. 143.